

評 Adam Fox, *The Press and the People: Cheap Print and Society in Scotland, 1500-178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xiii+449 pp.

陳建元\*

當我們言及「閱讀文字」，容易聯想到「閱讀裝訂成冊的書籍」。事實上，我們頻繁地接觸到印刷於書籍以外的文字，如街頭傳單、集會表演的歌詞紙，或是博物館、美術館的展覽摺頁。今人可能長期不曾翻閱任何書籍，然在生活中勢必仍大量閱讀如上述各類印有文字的紙張。在資訊大量透過數位方式傳遞的今日，人們仍如此頻繁地閱讀此類具備特定用途、短暫時效性的紙張，遑論電子媒體尚未興起前的近代早期。在近代早期歐洲，書籍對於多數人而言是昂貴的稀有物，廉價印刷品(cheap-print) 因此是多數人閱讀活動的主要媒介。

歐美學界自 1980 年代以降興起的新文化史、閱讀史，中文學界早有引介作品，並且也有根據中文材料所從事的相關研究，在此不贅述。不過，書籍史著作一般多研究裝訂成冊的書籍，像是啟蒙運動時期書籍史，探討書籍的生產和發行如何促進知識發展以及民族情感之變化。其關注的焦點主要是社會的上層和中層人士，他們如何消費有影響力的作品，推動新的思想，並影響了公眾輿論；本研究關注的則

---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是構成廣大讀者日常文字環境的傳單(handbill)、小冊子(pamphlet)和小書(chapbook)，就此種意義而言，本書反映出啟蒙時代書籍史的另一面向，也就是此時期出版品與學問所能接觸到的最底層。但是本書並不是要將精英與大眾市場二分，因為在此時期廉價印刷品也需要消費取得，其廣泛流通也呈現出思想在流通與傳布程度上的與日俱增。

在以精英階層為主的書籍史研究基礎上，自二十一世紀開始，史家對廉價印刷品的關注與日俱增，<sup>1</sup>學界現在認為，廉價印刷品不限於特定社會群體，而是各種人群在不同場合獲得知識與理解世界的手段。廉價印刷品、傳聞和八卦被視為資訊來源和指南，讀者透過它們在空間和時間上定位自我。人們可以透過廉價印刷品思考，它是一種交流實踐，也是權威性說法的來源。廉價印刷品很快成為一般大眾思考與理解世界的重要元素。

本書作者亞當·福克斯(Adam Fox)於 2000 年的專書關注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廉價印刷品、口頭文學及其背後的政治、文化意涵，<sup>2</sup>而自 2000 年之後，他的研究目光則是轉向近代早期蘇格蘭，本書《印刷品與群眾》便是作者二十年來研究成果的結晶。目前關於十六至十八世紀蘇格蘭圖書產業已有豐富研究，<sup>3</sup>學界對於其組織、特徵與生產量有

---

<sup>1</sup> 相關研究成果可參見：Patricia Fumerton, Anita Guerrini, and Kris McAbee, eds., *Ballads and Broadsides in Britain, 1500-1800* (Farnham, Surrey: Ashgate, 2010); Andrew Pettegree, ed., *Broadsheets: Single-Sheet Publishing in the First Age of Print* (Leiden: Brill, 2017); Joad Raymond,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Popular Print Culture*, vol. 1: *Cheap Print in Britain and Ireland to 166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sup>2</sup> Adam Fox, *Oral and Literate Culture in England, 1500-170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0).

<sup>3</sup> 例如：Alastair J. Mann, *The Scottish Book Trade 1500-1720: Print Commerce and Print Control in Early Modern Scotland* (East Linton: Tuckwell Press, 2000); Stephen W. Brown, and Warren McDougall, eds., *The Edinburgh*

相當掌握，然而，單張紙或是小書的研究仍然相對零星。此書是第一本詳細說明蘇格蘭印刷業在十九世紀工業化以前，廉價印刷品的生產、銷售與閱讀整體圖像的綜論之作，在蘇格蘭書籍史的研究中有其重要性。本書也呈現出研究眼光之變化，像是過去蘇格蘭印刷史大多採用書本與小冊子來進行研究，但是這種方式有其不足之處，例如會低估十六至十八世紀蘇格蘭有能力購買印刷品人口數。透過研究廉價印刷品，將可以指出群眾之中有閱讀能力的人數其實較過去推估為多，而且印刷品有多種被閱讀的方式，其讀者亦不限於「識字者」。因此，廉價印刷品的研究也體現了一種研究視角之轉移，學者開始正視其多元流通形式以及其背後蘊含的豐富資訊。

《印刷品與群眾》的核心論述為，在十六至十八世紀之間的蘇格蘭，那些保存至今，人們仍得以觸碰到的書本(book)、小冊子，其實僅佔當時出版物市場的小部分，真正流通數量龐大，而且是各印刷廠主力商品的是單面巨幅傳單(broadside，亦有雙面印刷，稱為雙面巨幅傳單[broadsheet])、小書與傳單。以上這些印刷品價格低廉，農民以及中下階層的勞工也購買得起。本書據此分別從「印刷品」與「讀者」兩大層面析論，探究形式最為簡單的印刷品在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蘇格蘭社會全境的分布和傳播情況，重建各種類型印刷品的背景，詳加說明他們的內容。

本書除了導論與結論外共分為兩大部分，每個部分各有五章。第一部分是「印刷消費市場的建立」，後一部分為「各類的廉價印刷品」。本文先扼要總結各章論旨，裨讀者對本書內容有整體性認識。接著探討本書的原創性以及對既有研究的修正與補充。第三部分則將本書與

---

*History of the Book in Scotland*, vol. 2: *Enlightenment and Expansion 1707-1800*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Murray C. T. Simpson, *Scholarly Book Collecting in Restoration Scotland: The Library of the Revd James Nairn (1629-1678)* (Leiden: Brill, 2020).

其他相關領域的著作參照，像是近代早期蘇格蘭的印刷品與閱讀群眾，該如何與英格蘭乃至於西歐其他地區的狀況相互發明、對話。最後則指出本書的成果將可以開啟未來哪些值得深化的方向。

由於過去的研究較為分散，本書第一部分便詳細交代近代早期蘇格蘭廉價印刷品從生產到銷售乃至於書籍種類等各項資訊。第一部分藉此指出，從十六至十八世紀，蘇格蘭民眾的受教育機會和識字水平不斷提高，從而培養出越來越多的文字閱讀者。此外，作者從蘇格蘭社會的整體工資水平和價格變化確定印刷品的成本，以界定「廉價」的含義。第一章分析人民識字率與購買能力，第二到第三章處理當時不列顛第二大的出版中心愛丁堡(Edinburgh)。第四章則是處理其他重要的低地蘇格蘭城鎮，如亞伯丁(Aberdeen)與格拉斯哥(Glasgow)印刷業的歷史。第五章則是探討沿街叫賣的街頭文學(street literature)。

福克斯在第一章指出，蘇格蘭出現閱讀大眾(reading public)是從十六世紀第一家出版社成立，到十八世紀後期蘇格蘭本地文學百花齊放逐漸發展的過程。廉價出版品的需求始終取決於經濟和教育程度。在這兩百多年的過程中，絕大多數的群眾已具備基本識字能力，且整個社會購買力逐漸提高，連帶使得蘇格蘭的廉價印刷品產業出現變化。在十七世紀末以前，真正庶民、通俗的文學作品仍受限於圖書業規模以及政府與教會的嚴密管制。但是從十六世紀開始，印刷品的讀者就不僅限於富裕的精英階層，至少在低地的主要城鎮皆有針對庶民的方言著作流通，且數量與流通範圍皆不斷擴大。到了十八世紀，蘇格蘭的大部分地區已形成一個各類廉價文學的巨大市場。

第二章指出，在蘇格蘭流傳的各種形式方言(英語)文學都是從倫敦市場進口，因此兩地閱讀群眾的讀物有相當的重疊性。然而愛丁堡的印刷商從十六世紀開始，也印製一系列鎖定在地市場的文學和廉價印刷品。遺憾的是由於存留至今的數量太少，以至於其重要性經常被忽

視。例如在查理一世統治期間，約翰·沃里圖恩(John Wreittoun, ?- 1640)曾出版過大量的民謠、小冊子，但是今日只留存下寥寥數本，這也顯示出在內戰前夕，蘇格蘭首都曾經生產在題材、數量上皆十分廣泛的廉價讀物，而當時蘇格蘭全國的印刷品市場比人們所預期的要龐大，且題材要豐富得多。

第三章探討蘇格蘭首都作為大眾印刷中心的具體印量及其重要性，乃至此類印刷品對近代早期蘇格蘭的文化產生哪些影響，重新思考、評估書面「文字」在蘇格蘭社會傳播的程度。既有研究讓我們熟知十七、十八世紀英格蘭廉價書市場中的重要人物，但若理解不列顛的通俗文學，不能忽略愛丁堡印刷商，以及他們發展出的特殊印刷文化。作者藉由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幾位印刷商，來討論愛丁堡如何從十六世紀一路發展為蘇格蘭本地的廉價印刷品中心。

第四章則聚焦首都以外的其他城鎮中心。儘管愛丁堡的地位突出，其他城鎮也是不斷擴張的廉價印刷品市場的重要組成份子。從廉價印刷品的歷史來看，這些地方印刷業的規模不大，品質不高，卻正是這些限制使得這些他城鎮的印刷廠別具意義，這些印刷品不是要與倫敦、愛丁堡所生產的精美版本競爭，而旨在提供低成本的替代品滿足地方需求。由於這些輕薄、效用短暫的文本只有極少數保存下來，過去人們因之低估它們的流通範圍以及影響力。這些地方層級的印刷廠的革新，也影響後來蘇格蘭通俗出版業的發展。例如在 1623 年亞伯丁出版的《亞伯丁年曆》(*The Aberdeen Almanac*)成為年曆這類家庭用出版物的領導者直至維多利亞時代(1837-1901)。

第五章探討存在時效短暫的廉價印刷品流通環境及其傳播方式。街頭銷售和消費是廉價印刷品的特點，寬幅和傳單、小冊子和小書都是用一、兩張紙製成的，沒有封面且便於攜帶，相當適合四處流動的小販銷售。此類出版物的內容通常是帶有公共性質的宣言、通知、新

聞等等，它們在公共場所兜售，並時常被張貼在顯眼的建築物上，或是被攜至空曠場所宣讀。本章雖然主要討論愛丁堡的狀況，不過也論及書面文字在蘇格蘭其他城鎮的傳播方式。透過探究印刷商的產品藉由小販進入普通市民生活中的具體脈絡，以及討論咖啡館提供報紙對人們閱讀的影響，本章補充了既有研究成果，重建廉價印刷品如何被取得、閱讀的這兩種管道。

第六章的主題是近代早期蘇格蘭在街上散發與張貼的傳單和告示。作者特別考察政府公告、時事新聞、輓歌詩、商業廣告和戲劇海報等廉價印刷品，指出這些遍佈在蘇格蘭的公共場所的各式傳單和海報構成頻繁接觸文字的環境。自十七世紀下半葉起，數以千計的短篇作品被以單冊文本的形式在蘇格蘭各地流通，其總數量至少有數百萬冊。這些作品在市集等處公開販售，是當代蘇格蘭社會中最为一般大眾熟悉的印刷文字形式。這對近代早期蘇格蘭低地城市的文化氛圍有重要影響，這些傳單和告示是當時人們的主要交流工具。

第七章析論十六世紀末至十八世紀末蘇格蘭印刷的絞刑架演說(gallows speeches)，這是迄今為止首次對此形式廉價印刷品的詳細考察。此類印刷品在街上出售，屬於街頭文學的主要類型。公開處決是民間矚目的事件，邪惡的罪行也是極佳的寫作題材，寫作這些演說詞的作家便利用這種恐怖場面的魅力，以各種形式廉價印刷品來達到說教的目的。絞刑架上的演說也構成蘇格蘭民間文學的獨特部分，演說辭的內容揭示了人們對犯罪和法律和懲罰的態度，並且對這個時期大眾心理有強烈之影響力。

第八章論述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期間蘇格蘭發行的巨幅傳單、民謠和歌曲印刷本。作者首先追溯英格蘭文本的輸入和蘇格蘭印刷業的生產狀況，接著評估英格蘭的歌詞和曲調對蘇格蘭單張單行本歌曲發展的影響。無論是單張紙還是簡單的小書，民謠是此時蘇格蘭印刷市

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本章復原且分析蘇格蘭民謠印刷品的詳細曲目，藉此說明近代早期蘇格蘭的政治事件和社會變革如何反映在這些廉價的通俗文本之中。

在近代早期的蘇格蘭，最普遍的廉價印刷品形式之一是年曆(又被稱為預言書)，這也是蘇格蘭通俗文學中最易於攜帶、實惠且被最廣泛消費的形式之一。十七、十八世紀蘇格蘭年曆的發展情況便是第九章的探索主題。本章重建了此類書籍的具體內容、大型印刷商的角色，並且追索其龐大印刷量與低價銷售方式。作者還探討著者身分以及在全國銷售流通的模式。不列顛的閱讀市場至喬治三世(George III, r. 1760-1820)在位期間分眾化的程度不斷提升，購買昂貴書籍的知識階層與閱讀廉價印刷品的一般民眾兩者之間區別越來越明顯。不過，年曆是這股趨勢中的一個例外。在十八世紀中葉以前，年曆流行於整個社會不同階層之中，貧窮階層在家庭、工作場所中，仍能夠接觸到此書面形式。年曆也是在城市、集市中最為民眾所熟悉的印刷品之一，其流傳規模顯示出庶民文學在當時的蘇格蘭流程度極為普遍。

最後的第十章則是處理近代早期蘇格蘭印刷的小型冊子(little pamphlets)和故事書(story books)。這些小出版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過去對英格蘭、倫敦的情況已有相當成熟的研究，不過蘇格蘭的詳細情況仍未有完整的通論研究，這正是本章的貢獻。小型冊子是廉價印刷品擴張和多樣化的關鍵，其將許多單張集結成冊，使得單張更容易保存，是當時價格最低、最容易傳播的印刷品。民眾可以從城市、鄉村街道上的小販買到，也可以直接從印刷商和書商那裡取得。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它們是用單張全開紙印製這些故事書，其內容有些來自英格蘭市場上翻印，有些來自蘇格蘭本地；既有詩歌也有散文。其內容多元，包含了教育、訓誡和娛樂等等目的的作品。

本書有幾項重要貢獻值得強調。首先，本書透過研究蘇格蘭印刷

品與社會，勾勒出十六至十八世紀這段時期蘇格蘭社會文化的特質：絕大多數人口都具備基本的識字能力、社會大多數階層的購買力逐漸提高。從十六世紀開始面向中下層群眾的蘇格蘭英語(Scottish English)的通俗文學作品就已經廣泛流通，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數量和範圍都持續擴大；時至十八世紀，蘇格蘭全國大部分地區形成了一個巨大，具備多元化文類的廉價出版品市場。

第二，本書對於蘇格蘭之研究成果，可以刺激讀者重新思考蘇格蘭印刷文化與英格蘭之關係，以及在 1707 年兩國聯合後對於不列顛文化之貢獻。在 1707 年之前，蘇格蘭書籍市場的來源大多來自於倫敦，儘管有部分是在愛丁堡等地翻印，此讓兩個王國在文學上保有一定的聯繫。而本書指出從十七世紀下半葉開始，蘇格蘭的圖書貿易規模開始擴大，蘇格蘭人所創作的廉價印刷品蓬勃發展。從十八世紀早期的約翰·蒙庫爾(John Moncur)，到世紀中的羅伯特·德拉蒙德(Robert Drummond)，再到世紀末的亞歷山大·羅伯遜(Alexander Robertson)等出版商，他們所發行的民謠、故事書、輓歌等等，不僅止於蘇格蘭的閱讀市場，在英格蘭各地也同樣暢銷。愛丁堡形成一個強大的廉價印刷品中心，提供了大量的閱讀材料給不列顛全島讀者。易言之，本書描繪出蘇格蘭從十七世紀文學文化的接受者，到了十八世紀具備輸出文化能力的過程。蘇格蘭出版商擴大、完善了不列顛全島通俗文學，讓這些暢銷作品成為全國人共同的閱讀材料。這是這時期蘇格蘭印刷文化對不列顛文化的貢獻。

第三，作者注意到蘇格蘭印刷業從十六至十八世紀始終存在的一個特色，也就是女性在出版產業的影響力。在這段時期的印刷和書籍業中，妻子與丈夫合夥工作十分常見，而當丈夫過世之後其遺孀往往會繼續擔任經營者，直到男性繼承人成年。過去往往將這些女性經營者稱為「繼承人」(heir)，而忽略女性在這個位置上的貢獻。福克斯系



統性地探討了這部分，並且詳加描述其中最為出色女性印刷商艾格妮斯·坎貝爾(Agnes Campbell, 1526-1601)。她不僅在丈夫早逝後一手撐起印刷廠，而且延續其作為蘇格蘭皇室御用印刷廠的壟斷地位，成功地作為蘇格蘭的圖書生產業龍頭達四十年。雖然她自己的名字沒有出現在印刷品上，但是她無疑是近代早期蘇格蘭印刷業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此外，過去研究者未注意到，部份女性是以自己個人的身份作為經營者而非基於配偶的名義。本書由此正視了這些蘇格蘭女性在近代早期印刷業的成就與地位，並且論證在此時期蘇格蘭印刷和銷售的各類書刊中，有相當部分是女性經營者的心血結晶。

第四，廉價印刷品留存至今的數量僅是其出版時總印刷量的九牛一毛，而從現存的史料中重新拼湊出當時的印刷品世界全景圖像，是本書最重要的貢獻之一。這些紙張因為過於脆弱，且用途多為即時的資訊，因此被收藏的數量極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曾經印刷數量最多的文本所保存下來的數量卻最少。至於那些偶然被保存流傳下來的，大多數也只剩下一件副本。」(頁5)現代讀者往往以為近代早期的印刷業是以書籍為銷售大宗，福克斯強調，單張紙、未裝訂的小冊子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小型紙張實際上方為印刷商的主力商品。從十六世紀的早期發展至十八世紀末期時，蘇格蘭的閱讀人士不僅限於上層，大多數人民的精神世界都是建立在各類文本上，尤其是廉價印刷品。至此，蘇格蘭人民的生活已經與印刷文明緊密相扣，無論書籍的內容是提供資訊、教化風俗或是娛樂消遣。因此，這些廉價印刷品之所以值得關注，與其說是它的內在價值或是與今日議題的相關性，不如說是將一個已逝去的世界鮮活地重現在我們眼前。

除了上述的貢獻以外，本書有不少論點值得更進一步思考，並且留給未來研究者一些值得深入探索的議題。在近代早期蘇格蘭，特別是在十七世紀下半葉之前，出版市場(包括廉價出版品在內)很大一部分的

產出來自政府贊助，而非由市場供需所驅動。而且這類出版物往往印刷量最大，大部分的內容反映政府的特定目的，而不是讀者的興趣。本書雖然提及教會、地方政府對於印刷品的管控，不過像是在小聖書、政府法令乃至於死刑犯臨終演說當中內容的特定社會、文化或政治目的，應可再進一步深入探究。換言之，本書已經處理印刷品對社會的影響，不過對於印刷品背後有哪些互相角力的力量，以及試圖達到何種目的的分析則是未來學者可繼續發揮之處。

例如，死前演說在英格蘭於十八世紀漸漸開始嚴格遵循某種格式以及半官方化，這當然是與當時的風俗改革運動有關，不過這類讀物在英格蘭的市場無疑跟蘇格蘭一樣不斷在擴大，其中的內容往往是謀殺、強姦與搶劫。然而也有特定的道德教訓部分：描述罪犯如何一步一步地墮落，進而將其與犯罪、酗酒、賭博、違反安息日規定和淫亂行為聯繫在一塊。著名政論家與記者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簡要地指出其特性：「那群可憐惡棍們的臨終遺言和懺悔中，他們告訴你，他們先是被不良的同伴所引誘，之後他們所陷入的邪惡團夥，不允許他們回到任何誠實的謀生之道，為此他們現在為自己被帶到如此可恥的結局而後悔哀歎。」<sup>4</sup>本書已經全面探究了蘇格蘭死前演說的出版情況，日後有志的學者當可分析其中內容來與英格蘭、愛爾蘭的狀況比較。應當注意的是，這類對罪犯生命結束場面的聳人描寫，絕不只針對廉價市場，只有富人才買得起的精裝本亦有類似內容，這種在高價與廉價市場並存的現象，以及背後對於不同讀者群的各端意義，也是值得繼續探討之主題。

進一步而言，這類演講詞也會成為論戰時的根據，例如在 1716 年

---

4 Daniel Defoe, *The Commentator* (1720), in *The Religious and Didactic Writings of Daniel Defoe*, vol. 9, edited by P. N. Furbank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6), 107.

出版，可能是笛福所著的《關於神職人員威廉·保羅和奧特本的約翰·霍爾演說的評論》(*Remarks on the Speeches of William Paul, Clerk, and John Hall of Otterburn, Esq*)，其中記載了威廉與約翰的臨終演講，他們是因為參與了詹姆斯黨於 1715 年的起事(The Jacobite rising of 1715)而被判處死刑。這位作者(可能是笛福)便否認兩份演講詞的真實性，並且藉此來反對詹姆斯二世(James II, r. 1685-1688)以及其子嗣具有蘇格蘭王位繼承權的觀點。由此觀來，臨終演說的真實性，以及背後捉刀人的意圖，在當時作家的眼中也都可能富含著政治或是其他方面的目的。此外，在 1718 年前後，笛福在其主編的《不列顛信使報》(*Mercurius Britannicus*)中積極呼籲政府應該壓制詹姆斯黨叛亂者的臨終演講，藉此來捍衛、鞏固漢諾威王室。而蘇格蘭的演講辭怎麼被引述、挪用則是日後學者可以繼續拓展的議題。<sup>5</sup>

總的來說，本書完成作者在導言中的目的，首次清楚描繪出廉價出版品在蘇格蘭全境的分布和在社會上的傳播情況，並且給予讀者近代早期蘇格蘭印刷品的整體圖像，明白這些廉價出版品的具體流通範圍以及途徑。過去關於這段時期蘇格蘭日常生活和社會變革的描述，幾乎沒有考慮到單頁印刷品和小冊子在構建和反映一般大眾的世界觀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本書有力地論述廉價印刷品如何影響人民的日常經驗，如何作為通俗文化資訊流通的管道，並且藉此重新評估工業革命時代前蘇格蘭文字印刷品與普羅大眾之間的關係。

(本文於 2021 年 2 月 23 日收稿；2021 年 5 月 17 日通過刊登)

\*本文承蒙審查人惠賜專業意見，筆者深表感謝。寫作期間獲得傅揚與吳政緯兩位先生指正，在此深致謝忱。

---

<sup>5</sup> Paula R. Backscheider, *Daniel Defoe: His Lif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458-459.